



光洲评论

得理不饶人者常受诟病。对此,他往往还十分委屈:明明是自己“占理”,为什么不能使对方“服软”,也得不到周围人的同情与支持呢?

得理不饶人者,输在一个“偏”字上。再大的“理”,也需要人的理解与认同,才能转化为行动。

理若不能深入人心,如何彰显其价值?得理不饶人者只是片面强调自己占理,而不考虑如何让对方理解、认同、接受,一味地执拗死缠,除了催生逆反,岂可服人?

所谓“理”,或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是分割利益“蛋糕”时的规则,说到底,是一种标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留鸟不解候鸟为什么老搬家,鸵鸟爱沙漠,鱼鹰不离水……

各鸟秉承各鸟的理,怎么可能以一鸟之理而令天下之鸟整齐划一呢?

人与人产生矛盾,爆发冲突,据理力争,所据之“理”,往往是对己有利、于对方不利的标准。何不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一下呢?“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能与对方换位思考,便不难把双方的“理”看明白、想透彻,从而在得理之时知进退、明取舍,游刃有余,最终以得理巧饶人的艺术获取双赢。

得理巧饶人,需要的是大智慧。据说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收到老家的来信,诉说与邻居为住宅边界打官司一事,希望他出面解决。按说理在张家,以张英的地位,他完全能“征服”对方。

然而,张英在信上批诗一首寄

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信后主动让地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退后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遂成佳话。

张英得理巧饶人,以退为进,给对方出了道选择题:张家让步后,邻居若再强硬必陷入舆论唾骂之中;若以张家为榜样,还能罩上仁义的光环。邻居果然在感动中进入了仁义礼让的轨道。张英得理,尚能如此审慎而巧妙地选择方法,赢得传世美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得理巧饶人,不是懦夫的表现。相反,只有内心强大者才会饶人,才有资格饶人。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展现出的是大度之美。

得理巧饶人,不是搞阴谋诡计。阴谋诡计只会害人,岂能饶人?得理巧饶人是采取迂回策略,从而更好地、更充分地贯彻“理”。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展现出的是睿智之美。

得理巧饶人,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得理巧饶人者其实已看到了长远的发展:人在岁月的长河中,谁不需要别人的谅解与宽容呢?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展现出的是仁厚的善良之美。

能容人者,才能为人所容。得理巧饶人者,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在遇到不是“你死我活”的非根本性对抗矛盾时,您会得理巧饶人吗?这既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能力与智慧,仔细想想,还真是一门学问哩!

◇杨光洲



日前,中山大学法学院一学生寄行李回家,被快递公司多称重了十几斤。这名大学生就此提起诉讼。据南都“记者帮”报道,因申通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不诚信行为”,一、二审法院判决均支持原告三倍索赔的诉求。原本一场很普通的民事诉讼,本案一审公开审理的庭审直播录像,在网上的播放量是庭审法院其他案件的数十倍。

短评:与其说人们关注这起案子,不如说人们更关注本案的原告。一位法学院的学生,初出茅庐,小试身手,表现究竟如何?这位未来的法律人没有让大家失望。他能学以致用,用自己学到的法学知识维权,展现出了法律人应有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与运用法律的能力。他以实践证明自己学有所成。从他身上,家长看到的是他所学本领,可以安身立命;公众和专家看到的是法学院学生应有的专业水平。传说少林武僧出师,要打出由师兄、师弟阻拦的一道道山门。愿如今更多的大学生,也如这位以诉讼检验自己所学的学子,在社会实践中证明自己之所学,如打出山门的少林武僧一样,有真功夫。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浙江省首例女性权益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今年9月,杭州市钱塘区某街道发布公开招聘村级后备干部公告,涉及街道下辖的20个村社,其中12个村限定只招男性,男女岗位人数比例为22:7。针对招考限制岗位性别,钱塘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涉事街道现整改为招录岗位男女性别比例一致。

短评:就业的性别歧视现象,目前还比较普遍。在各种招聘、招录中,故意不招女性或不合理地限制女性,是对女性平等就业权利的侵害,是违法的。对这种违法现象,女同胞有意见,媒体有批评,但是,有些违法者依然我行我素。杭州市钱塘区的这个涉事街道为什么改正错误了呢?因为该区检察院介入了,提起了公益诉讼。看来制止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光靠教育不行,必要的时候,得用法律武器动点真格的。让歧视女性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才更有力量。

日前,重庆市15家医疗美容机构因存在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其中最高被处以罚款25万元。所涉及违法行为集中在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使用过期医疗器械、未备案主诊医生单独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等方面。

短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若对医疗美容机构选择不当,不仅得不到想像中的美,还可能变丑,甚至导致伤残。为确保接受医疗美容的消费者的权益,执法部门当然要依法加强监管。同时,消费者也应增长一些相关知识,不要落入无良医疗美容商家所设的陷阱。对有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其实,有时消费者凭生活经验也能判断出。比如未按规定填写病历、接诊医生没有资质公示等。千万不可把自己的容颜健康交给不负责任的机构。否则,一旦出了事故,对方再真诚的“对不起”和再多的金钱,可能都是于事无补的。

近日,广州90后房东董焕怡夫妇决定为十余名租客减租15天,以减轻疫情封控区租客的经济压力。租客大多是个体户和工人,停工一天就损失一天收入。董焕怡夫妇觉得租客基本上都是“手停口停”的劳动者,要体谅他们身处疫情封控区的生活困难,就主动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租客们希望能减租10天。董焕怡夫妇提出给租客们减租15天。董焕怡了解到一户租客家里经济负担较重,两个孩子受疫情影响不能到校上课,就给这户租客发红包,让租客给孩子网购练习册在家自学。董焕怡夫妇还在微信群里祝福租客们疫情解封后财源滚滚,叮嘱大家这几天就当放假,好好休息,要相信好运气总会不期而遇。董焕怡夫妇被网友们尊称为最美房东。

短评:寒冬里,人们渴望暖阳。大灾中,人们需要大爱。主动为租客减租的董焕怡夫妇,他们的爱心,就是租客心中的暖阳。防治新冠病毒,需要我们团结一致,而爱就是我们众志成城纽带。你身边有因疫情而遇到困难的人吗?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为社会增加和谐,为抗疫增添力量与希望。你也可以成为受助人心中的最美。

据央视报道,我国中高级技工需求旺、薪资高,但缺口大,有职校毕业生“人手2到4个录用通知”。报道引发热议,“职校学生人手2到4个offer”“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未毕业就被抢空”两个话题引爆热搜。不少网友表示,“这才是职业教育该有的样子”“确实需要转变观念了”。

短评:学以致用,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然而,曾几何时,企业在选人用人时,盲目追求高学历、名校出身。结果,有时招进来的人,空有理论,不能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终成没有实用价值好看不好用的花瓶。汉末曹操在选人用人时不看出身,看真实才干,所谓唯才是举,招揽到大量英才,引领其事业不断走向成功。如今,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在招人时,是追求名校、高学历,还是讲求实用,以真正有用之人增强企业实力呢?中高级技工和职校生在职场的炙手可热,就已显现出了企业的选择。面对企业的选择,有关方面是也应当做好教育规划,以满足社会需求。

权钱掮客

一个贪官三个帮,
攀附大树好生长。
促成钱权手拉手,
掮客搭桥生意旺。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诗



漫说“权利”译名由来

◇沈 栖

在我国传统文献里,“权利”一词可谓源远流长。如《荀子》《史记》《盐铁论》均有论及,但其意为权势与货材。《商君书》中的“权利”则是指“权衡利害”。法学概念的“权利”(Right)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在《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中提出来的。它体现“主权在民”的理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Right”一词引进中国,首先归功于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时,为了掌握实情,了解各国的现状和动态,以制打出交涉的策略,大量收集西方有关外交的法律制度,其中就有瑞典著名国际法学家埃默里克·德·滑达尔《万国法》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他嘱属下译员袁德辉摘译,并由美国传教士伯驾修改定稿,定名为《各国律例》,以此作为对英外交斗争的理论武器。这部分译文后来被魏源辑录于《海国图志》。

吊诡的是,《万国法》一书中含有正当性和自主性的“Right”一词在《各国律例》中却译成了“道理”,等于只译出了其道德的“正当性”的特质,却缺失了主体的“自主性”的意涵。其实也无须苛求,《各国律

例》纯粹是基于对外,罔顾内求,当时林则徐的思想认识停留在维护王权,除此之外,不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权利”。王权是排他的、不能分享的。按照中国传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决事独断,既然是“家天下”,那么,出自维护王权的“道理”即是具有“正当性”,何以再考虑民法与民权上的“自主性”?因此,以“以夏变夷”“以夷制夷”为指导思想的林则徐压根儿就不会想到“Right”的“自主性”,即使是以“正当性”也是置于传统儒家伦理层面考量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虽说打了败仗,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作为一个主权国,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处理“夷务”的总理衙门,开启了对外交涉的第一个窗口。它与西方国家的接触频繁,冲突增多,亟须了解和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外交事务,这是清廷上层开明人士所孜孜以求的。1863年夏,清政府与法国交涉时遇到困难,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便请美国公使蒲安臣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性国际法著作,此议得到主政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的全力支持。几乎同时,于1850年来华

任美国公使通事的丁铎良致函蒲安臣,想将惠顿(曾在欧洲任外交官20多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学教授)的名著《国际法原理》(丁定名为《万国公法》)中有关战争、敌对措施和封锁、禁运等内容译成中文推荐给中国,以迎合清政府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的需求。所见略同,一拍即合,悄然实现了从《各国律例》向《万国公法》的拓展。1864年8月,《万国公法》由总理衙门奏请从关税中拨银500两资助出版。旋即,这本东亚第一本国际法学的书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翻刻刊行。而丁铎良译介《万国公法》,在中国赢得声望,被清廷聘请为同文馆国际法总教习。

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铎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堪为清末在华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的“双向译介”,即: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如《天道溯源》《西学考略》等),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如《中国的传统与诗歌》《汉学菁华》《中国的觉醒》等),构成了近代西学东渐、汉学西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万国公法》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外交理念近代化的形成,为清廷处理外交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丁铎良经过反复

斟酌,将“Right”一词直接译为“权利”,这在中国可谓是一个彪炳史册的首创。丁铎良在《万国公法》中以“自主”来翻译西方的主权观念(“邦国自治自主之权”),使“Right”既有道德的“正当性”的本质,又有主体的“自主性”的内核。正是丁译对“权利”的主体进行了转换,才使之作为《万国公法》的关键词而具有普世价值并获得与其相应的法权形式。

虽然丁铎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已将“Right”译为“权利”,并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沿用,但之后这一近代政治思想的新词还是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严复在1898年汉译《天演论》时,致梁启超《尊经先生覆简》中说:“唯独Right苦于此字无译。”他既认为袁德辉译为“道理”显得“浅陋”而不予认同,也批评丁铎良译为“权利”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经过一番推敲,他终于以“直”字翻Right尤为铁案不可动也”。他在《群己权界论》中,将“Right”分别译作“民直”“天直”,前者取代“人民权利”,后者取代“自然权利”。

值得欣慰的是,对“Right”一词,历史并没有接受严译,丁译“权利”成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法律术语,并润物无声般地融入了国人的政治生活之中。

◇游宇明

两位文人的家书

民国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先是军阀你打过来,我杀过去,后来是日寇大规模入侵,大半国土沦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是那个时代最形象的写照。

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就在那样的乱世里,一些有骨气的人文人依然坚守着道义,支撑着家国。

1919年5月,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闻一多接连收到两位哥哥的来信,说父亲要求他回乡度假。实际上是父母知道北京局势很乱,希望闻一多回湖北躲躲。当月17日,不满20岁的闻一多给父母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譬如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今年不

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两大人虽不见男犹见男也。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靡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两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就回家还是离校的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他希望父母理解自己的选择,支持自己在国有危难时挺身而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其时的林徽因正与夫君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考察唐代建筑,并不知道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7月12日,两人骑马走出五台山,方知山外的世界面目全非。在路上,林徽因给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到“七七”事变:“现在我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的,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

方,这一次又是为一点小事就出兵打我们……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们就守在北平,等打胜了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中国人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表面上看,林徽因的家书与闻一多的区别很大,后者谈论的是个人在内政中想要坚守的立场,前者则是表白自己对外敌入侵的态度。但其内里却高度一致,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全国家,承担一个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

闻一多与林徽因家书中的别样情怀,无法不让人感动。民国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实现,类似于阿Q和华老栓式的愚民并不罕见,替黑暗背书、为邪恶站台的人占了一定比例,作为那个时代的明白人,他们超越个体得失、不计生命安危的品质,犹如雪地上的梅花、蓝天

中的白云,自然显得格外耀眼。他们并非作假,而是用整整的一生证明了初心:一个在黑暗年代以生命殉理想,一个在艰难中守护着民族文化,直至春暖花开。

世间没有无因之果,闻一多与林徽因强烈的家国情怀,首先与其对社会的认知有关。自私自利的人看到的永远只是一己的身影,这些人不知他者,更不知民族、国家。格局宏大的人则会认识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家安宁富强,自我才有幸福。

闻一多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父亲教他从小读《汉书》等古籍,小时候便从诗书里体会到了家国的分量;林徽因更是出身于名门,其父亲林长民在当时的政坛上非常活跃,曾做过国务院参议和司法总长,林徽因不仅自幼熟读传统经典,长大后更从长辈的做人处世中领悟到一个人应具的天下情怀,所有这些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后来的政治选择。

